

韩·中文人关于山东登州咏史诗之比较研究

- 以中国明朝年间为中心 -

朴顺哲 许宁*

—— < 目次 > ——

- I. 序言
- II. 登州咏史诗比较
 - 1. 思想内容特征
 - 2. 表现手法与诗体特征
- III. 结语

I. 序言

韩中两国自古便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睦邻，两国之间已有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历史。中国明朝时期恰是朝鲜高丽末期和李朝统治的初、中期，两国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交流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位于山东半岛东部的登州¹⁾在明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朝鲜使臣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²⁾。登州不仅是重要的通行港口，还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因登州海市这一奇妙的自然现象，自秦始皇时起便于求仙问道结下了不解之缘，演绎出众多的仙话传说。中国明朝时期，与汉文化关系至深的朝鲜使臣们在经由登州时也竞相赋诗吟唱。由于使臣的特殊身份，他们大多是当朝著名的文人大家，具有着深厚的汉文功底，熟知中国的历史典故，所作的汉文诗歌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中国明朝文人亦不乏吟咏登州之作，著名的诗文大家王世贞及其弟王世懋、戚继光、吴维岳、陈其学等及很多蓬莱当地诗人都在登州留下了精美的诗文，这些诗作也大多被保留在地方府志、县志之中。虽然“山东在元末明初是明军北伐的前线，所受到的战火的破坏，比起其他许多省份来，

* 朴顺哲：全北大学校中语中文系教授，

** 许宁：全北大学校中语中文系硕士结业

1) 即现在的蓬莱市，属于山东省烟台市的县级市。登州行政区始建于621年，废止于1913年。

2) “明代路经登州的朝鲜使节团主要是在明初洪武年间和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参照刘焕阳、刘晓东著，《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33页

尤为严重³⁾”，诗文创作受到不少影响，明朝前期的诗作数量较为惨淡，但自弘治年间起，前往登州府做官巡查的文人有所增多，诗文逐渐出现兴盛。本文将以中国明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界，将明代文人笔下的登州诗作和与明代相当时期内的丽末鲜初、朝鲜中期的使臣们的登州诗作为比较对象。由于两国文人在登州留下的诗文类型丰富，本文仅以咏史诗为例，从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这对我们更好地了解两国文人的诗文创作情况及透过咏史诗所折射出的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文化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II. 登州咏史诗比较

具有着两千多年创作历史的咏史诗，作为典型士大夫文学的代表，其自身鲜明地体现着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咏史诗大多借古人古事或古迹为发端，在对历史有着深刻感悟的基础上，感兴而作。或抒写怀抱，寄寓诗人的个体感情；或借古喻今，抒发诗人的抑郁不平；或借题巧弹弦外之音，旨在讽刺。其思想内容涉及国家兴亡，君臣道义，个人抱负等各个方面，在艺术表现上更是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等众多修辞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可谓文情并茂，情理相兼，在古代诗歌中的地位不可小觑。朝鲜古代的汉文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咏史诗更是在新罗时代便已出现，其创作上亦继承了中国的咏史诗的优良传统。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两国文人在山东登州一带所作的咏史诗，就此情况而言，登州本就属于历史遗迹，因地吊古的怀古诗、注入历史因素的咏怀诗，自然都属于咏史诗的一部分，在本文中对咏史、怀古及咏怀不作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而将其归入较为宽泛意义上的咏史诗。众所周知，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与诗人所处的年代、地域及诗人自身的思想内心世界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在明代这样一个相同的历史时期内，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两国文人在登州所作的咏史诗是否存在异同？本文欲以此为切入点，对登州咏史诗作所反映出的两国文人在思想、文学上的观念及汉诗表现技巧等方面进行深度挖掘。

1. 思想内容特征

咏史诗虽以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但也是诗人思想意识的真实反映，贯穿着诗人的史学观、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⁴⁾跨越文史两大领域的咏史诗以诗歌的形式来吟咏历史题材，阐明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寄寓着诗人独特的历史感受与见解，是文人士大夫思想深处的真实折射，最能反映出特定时期文人个体的思想心态，因而具

3) 乔力、李少群等主编，《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629页

4) 赵望秦、张焕玲著，《古代咏史诗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7页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下文中将通过对两国文人咏史诗作的分析来概括其思想内涵，进而探究其异同。

1) 以古鉴今、寓论于史的朝鲜士大夫咏史诗

通过对朝鲜使臣在登州所作咏史诗的整理不难发现，朝鲜使臣笔下的咏史诗具有着鲜明的士大夫特色。虽身在异国，行使路途艰辛，但仍一心系挂着国家安危。或吟咏某些历史事件，以古鉴今，别有寄托；或歌颂历史上的圣主贤臣，观照自己，一展抱负；或追思历史名人，勉励自己，尽早完成出使任务，为国建功立业。其思想内容的重心始终以国家社稷为主，是不折不扣的士大夫诗作。

朝鲜使臣的登州咏史诗作中，通过吟咏史事以求对现实起到借鉴作用，抒发士大夫经世情怀的诗作，大多是以秦皇汉武在登州一带求仙之事为主要题材。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时常会出现“海市蜃楼”这一自然现象。古时先民们无法对海市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故将海市蜃楼视为神秘的神仙世界。后由此孕育出一系列的神话传说，在别有用心的方士们的大肆宣扬下，帝王们也开始迷恋起求仙问道，热衷于追求生命的永恒。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多次来登州寻访仙人，这在史书中都有相关的记载。荒诞无稽的求仙之举常常为后人耻笑，经由登州的朝鲜使臣们也多以此事为题材展开评论，在诗文中对秦皇汉武劳民伤财的荒唐之举进行了坚决的否定。

明洪武十九年(1386)，郑梦周⁵⁾为请求减额岁贡等事宜出使明朝，在返回途中，登临蓬莱阁，写下了《蓬莱阁》⁶⁾一诗，诗的末尾写到：“徐生诈计非难悟，自是君王有欲心”。郑梦周对徐福的“诈计”看得相当透彻，得出是秦始皇被自己欲望所蒙蔽的结论，对求仙一事发出深切的感慨，对后世具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理学大家权近⁷⁾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作为从事官前往明朝以求改善两国关系，归国途中在登州停留，写下了组诗《宿登州蓬莱驿，咏怀古迹四绝》⁸⁾，其中写到：

祖龙鞭石竟无功，谁见神山不死翁。
三十五年真一瞥，终教鲍臭满车中。

秦始皇在位期间一直迷恋于长生之道，一代帝王最后死于求仙途中，落得用一车臭鱼来掩盖尸臭的下场。诗人用尖锐的诗语对此事进行了辛辣的讥讽，希望引起后世的警戒。对不

5) [韩] 郑梦周(1337~1392)，字达可，号圃隐，谥号文忠。朝鲜高丽王朝末期时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被誉为朝鲜理学之祖。负责同中国明朝重建朝贡关系，曾多次往返于登州。

6) [韩]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89页

7) [韩] 权近(1352~1409)，字可远，思权，号阳村，谥号文忠。朝鲜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

8) [韩]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203页

以秦皇为鉴，繼而又重蹈覆辙的汉武帝，权近在组诗中紧接着发出感慨，“汉皇何不鉴秦家？”汉武帝是繼秦始皇之后，又多次来登州一带寻访仙人的帝王，最终的下场是“武陵异日生秋草，万里空祠万里沙”。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春，汉武帝“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夏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⁹⁾”汉武帝荒唐求仙，为师出有名，竟去祭祀万里沙，由此也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对中国史事有着深入的了解。李稷¹⁰⁾也在《次章寺丞韵》¹¹⁾一诗中感慨到：“徐生肯采瀛洲草，秦帝徒闻冰壑荷。尚想当年枉行幸，至今遗迹警人多。”朝鲜使臣们在诗文中对徒劳无功的求仙之举进行了坚决的否定，希望能够警醒后人，切勿重蹈覆辙。

朝鲜中期经由登州的使臣们亦不忘此事，李民成¹²⁾在《登蓬莱阁》¹³⁾一诗中也发出感叹“秦皇何所得，汉帝亦无成”。崇祯元年朝鲜冬至圣节使团书状官申悦道¹⁴⁾在《归路登蓬莱阁》¹⁵⁾中亦写到“一去仙童终不返，三神灵药竟难求”等。由此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在登州所作的咏史诗作，取材倾向集中于对秦皇汉武来蓬莱求仙之事，注重对秦皇汉武的过失进行评论，探讨君道问题。诗歌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倾向也很明确，就是坚决地批判否定。

此外，通过吟咏历史史事，以求对现实起到借鉴的咏史诗作中，也有通过对隋炀帝暴政统治的讥讽，来警示后人的。如权近在组诗的最后提及隋炀帝曾穷兵黩武下诏讨伐高丽，不禁感慨万千，在诗中写到：

手脚生蛆众力疲，人心天命已离隋。
楼船百万终安用，萨水流尸自可悲。¹⁶⁾

诗人用“手脚生蛆”、“萨水流尸”这样的诗语从侧面烘托出隋炀帝的暴政统治，最后落得人心尽失的下场。朝鲜使臣善于通过历史，充分发挥诗歌的功能，来探讨君道问题。

朝鲜使臣登州咏史诗的士大夫特色也体现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圣主贤臣的赞颂，以历史来观照自身，寻求共性，勉励自己实现内心的抱负。如权近在《宿登州蓬莱驿，咏怀古迹四绝》¹⁷⁾组诗的开头写到：

9) 司马迁，《中华文化名著典籍精华·史记》(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第80页

10) [韩]李稷，(1362~1431)，字虞庭，号亨斋，高丽末期、朝鲜初期的文臣。曾先后两次出使明朝。

11) 袁晓春编注，《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第61页

12) [韩]李民成，(1570~1629)，字宽甫，号敬亭，朝鲜王朝诗人。明熹宗天启年间出使中国，任朝鲜使团书状官，著有《敬亭集》等。

13) [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426页

14) [韩]申悦道，(1589~1659)，字晋甫，号懒斋，朝鲜王朝后期文臣。明崇祯元年任朝鲜冬至圣节使团书状官出使中国。

15) 袁晓春编注，《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第187页

16) 见注8

17) 见注8

荡荡陶唐乃圣神，授时宾日最勤民。
信知帝德如天大，吻谷和均四海春。

这是一首歌颂尧帝和羲仲的诗。陶唐即唐尧，是古代传说中的圣明君主。据《尚书·尧典》中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¹⁸⁾。“授时宾日最勤民”一句便来源于“分命羲仲，宅嵎夷，曰吻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¹⁹⁾”。帝尧任命羲仲在嵎夷的吻谷，每天恭敬地迎接日出记象天时来昭告百姓，帮助百姓从事农作物耕种。帝尧的功德使得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都享受到了和美的春光，不仅仅是中原华夏一族，甚至连周边的四邻小族也备受恩泽。诗人通过对帝尧和羲仲的赞美，流露出对华夏文明的仰慕感激之情，并希望以此来勉励自己，像羲仲一样兢兢业业，为国家和人民尽心尽力。吴翻²⁰⁾在《镇海楼》²¹⁾一诗中也写到“秦童汉使知何处，禹贡尧封想至今”，对秦皇汉武荒唐的求仙行为给予否定，而对唐尧夏禹的丰功伟绩表示由衷的钦佩。

此外，还有不少通过追思历史名人，联系自身际遇，以此来勉励自己，希望能够尽早完成出使使命的诗作。天启三年(1623)，李民晟身负使命乘船泊到登州时，以历史名人苏季子来激励自己，希望自己也能够不辱使命。

登州咏怀²²⁾
骚人遥倚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
笑杀秋风苏季子，穆陵关外弊貂裘。

天启三年，朝鲜发动了“仁祖反正”的宫廷政变，朝鲜绫阳君李倧推翻了光海君李瑈登上了王位，但当时的明朝对纲常伦理根深蒂固，对朝鲜擅自发动政变废除君主一事表示不满，拒绝承认李倧的合法地位²³⁾。因此朝鲜便派遣李民晟等使臣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府袁可立，希望他代为向明朝奏报国王更替事宜，请求明朝册封李倧为合法国王。李民晟在《朝天录》中也有记载：“天启三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政。差奏闻使书状官。四月初四日。祇受有旨。²⁴⁾”虽肩负如此重大使命，但诗人依然充满自信，并借助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的典故来激励自

18) 四书五经古典影印《书传》，韩国保景文化社出版，1983，第26页

19) 同上引，第27页

20) [韩] 吴翻，(1592~1634)，字肃羽，号天坡，朝鲜中期文臣。著有《天坡集》。

21) 袁晓春编注，《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第121页

22) [韩]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420页

23) 当时登莱巡府袁可立上疏明熹宗：“李瑈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

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瑈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瑈，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详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24) [韩]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264页

己。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成功说服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王，佩挂六国相印出兵秦国。诗末“穆陵关外弊貂裘”一句典自《战国策》卷三《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²⁵⁾”整首诗作洋溢着诗人一定会不辱使命、成功说服明朝承认朝鲜新立国王合法地位的必胜信心。

通过以上诗文分析可以看出，朝鲜使臣笔下的咏史诗具有着鲜明的士大夫色彩，透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窥探出古代朝鲜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形态深受儒教的影响。儒教与道教作为古代文化的两大支柱对古人崇古、怀古、以史为鉴等文化心态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儒家价值观念下叹咏古事，在感慨中必对史事有所褒贬评价，希望能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对当今的社会政治或是自己的人生有所指导，这点在丽末鲜初时期朝鲜使臣的诗文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朝鲜文人士大夫思想深受儒教的影响，这与高丽后期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推崇有着极大的关系。自丽末鲜初时期起，程朱理学在朝鲜得以极大盛行，对文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高丽末期，随着朱子学的传入，文学的本质不能从文学的内质上得到辨别，相反依照文学以外的思想标准来论议的传统文学观念得以确立。此后，文学只作为‘道’的表现手段，‘文以贯道’或‘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成为重要的话题²⁶⁾”。受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文坛的文风也为一改，丽末鲜初时期文学的创作更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与教化性。明朝初期前往中国出使的郑梦周、权近、郑道传等人均是当朝著名的理学大家，深受儒家思想意识支配的新兴文人士大夫自然也将儒学思想渗透融合到文学创作之中。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政治局面，他们在登州所作咏史诗的思想内容大多是在儒家价值观念下，理性地看待历史，注重以古鉴今，通过吟咏古人古事，参照历史，对现实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这种重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传统，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教观，是儒家思想对诗文创作影响的体现。此外由于使臣特殊的身份地位，又多是朝廷的高官重臣，他们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感及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

2) 抚迹寄慨，寓情于史的明代文人咏史诗

纵观明代文人的登州咏史诗作，所吟咏的历史题材虽也不外乎秦皇汉武，安期生之类的与寻求仙药及长生不老等有关的历史事件，但却没有一味地沉浸在对历史的泛泛吟咏之中。登州一带风光秀丽，有着独立的自然审美价值，明代文人墨客们更善于以独特细腻的文学眼光去欣赏登州古城的山水物色，并将山水之美与历史沧桑之感相互融合，触景生情，抚迹寄

25)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85页

26) 闵丙秀，《韩国汉诗史》，太学社出版社，1994，第161~162页 “고려말에 朱子학이 수입됨에 따라 문학의 본질이 문학의 내질에서 변별되지 못하고 오히려 문학외적인 사상적 표준에 의하여 논의되는 동양사회의 전통적인 문학 관념이 성립하게 된다. 그리하여 이후, 문학을 한갓 道의 표현수단으로 생각하는 ‘文以貫道’나 ‘文以載道’와 같은 전통적인 문학관이 중요한 과제로 부각되어 왔다.”

慨，寓情于史。特别是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所创的咏史诗更是呈现出盛唐咏史怀古诗的韵味，这段期间的咏史诗作多集中于诗人个体感情的抒发，借秦皇汉武求仙一事来抒发沧海桑田之情。

如正德年间，赵鹤²⁷⁾在《登州蓬莱阁观东海》²⁸⁾一诗中写到：

愁云尚识田横岛，仙月还虚汉武台。
回首夕阳瀛海上，一尊怀古独徘徊。

傍晚诗人独自徘徊于蓬莱阁上，脑海中浮现出与登州有关的古人古事，思愁万分，回首夕阳下的沧海，古人胜事均已不在，唯有徘徊独饮慰藉自己，感情深沉凝重。

明代中期文人们在登州所作的咏史诗中，虽对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虽也多有提及，但其目的不在于评论帝王得失，对君道问题的讨论甚少，因而在对待秦皇汉武求仙一事上流露出的感情较为平淡，这点与朝鲜使臣在诗歌中流露出的经世意志不同。“嘉靖广五子²⁹⁾”之一的吴维岳³⁰⁾在《登蓬莱阁六绝》³¹⁾组诗中，将山水美景与发人情怀的历史感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一种平静而惬意的心态去审视前贤与山水古迹，呈现出格调清雅的特征。

登蓬莱阁六绝

其一

蓬莱阁上起鸾笙，碣石云红峤气清。
海水冥冥春又绿，至今无处问徐生。

其四

鞭石乘槎迹未分，众山杯外送斜曛。
漫将海水论深浅，历尽沧桑是白云。

《登蓬莱阁六绝》其一，先是描写了蓬莱阁上笙箫四起，临海的碣石，泛着微红云朵的天边，丹崖山顶端云雾缥缈，海气潮湿。后两句“海水冥冥春又绿，至今无处问徐生”道出诗旨，深不可测的海水年复一年泛出绿色，至今也无处探寻徐生的下落。

《登蓬莱阁六绝》其四，开头巧妙地将历史史事融入到景物之中，“鞭石”源于秦始皇时

27) 赵鹤，字叔鸣，号具区，江都(今扬州)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户部主事，正德六年(1511)任金华知府，以忤刘瑾谪官。后起为山东提学佾事，生平嗜学不倦，晚年注诸经，考论历代史，正其谬误。诗耻凡语，于古爱谢灵运，于唐爱孟郊，于元爱刘因。

28)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48页

29) 明代诗坛上，吴维岳、卢楠、欧大任、俞允文、李先芳合称嘉靖广五子。

30) 吴维岳，(1514~1569)，字峻伯，浙江孝丰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曾与李攀龙等倡诗社，为“嘉靖广五子”之一。有《天目山斋岁编》二十四卷。

31)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23页

神人鞭石的典故，“《太平御览》卷四引《三齐略记》：‘秦始皇作石桥于海上，欲过海看日出处。有神人驱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桥犹赤色。’”³²⁾在诗中用“鞭石”这一典故借指秦始皇求仙一事。通过自然万物的亘古长存与古人瞬逝、古事无迹相对比，在描写山水景色的同时抒发了古人胜事不在，历史终将逝去，折射出强烈的历史幻灭感。

明代文学大家王世贞³³⁾在《和吴峻伯蓬莱阁六绝》³⁴⁾组诗中也写到：“风雷忽卷秦桥去，日月还依禹碣悬。”秦始皇到蓬莱求仙药，徒劳无功，只有山河日月依旧。明代中期受文学复古思潮的影响，咏史诗的创作也多以抒发个体感情为主，将情感寓于史实之中。与朝鲜使臣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相比，明代文人在诗中更多地折射出的是道家或是儒道兼容的思想，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去咏怀古迹，历史终会逝去，只有天地万物永存。

明代后期，随着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内忧外患加剧，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中，文学的创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世救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开始在文人阶层中逐渐萌芽，诗歌创作也由抒写性灵转变为家国将覆、生死节义、保家卫国等。特别是登州在明代万历“壬辰战争”中作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协助朝鲜，抵抗日本，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少将领在登州所作的咏史诗包含着保家卫国等爱国情操。如一代名将蹇达³⁵⁾在《登蓬莱阁》³⁶⁾一诗中写到：

阁俯沧溟接混茫，相将词客兴飞扬。
波涛今古吞元气，岛屿东西挂夕阳。
仙圃几人求大药，孤根何处托扶桑。
万流转识朝宗意，并倚危栏望帝乡。

此诗应是诗人在山东任职时所作。“阁俯沧溟接混茫，相将词客兴飞扬”，诗的前两句先是对蓬莱阁的地理位置进行的描写。在蓬莱阁上俯视便可望见一望无际的沧海，文臣武将，文人骚客都竞相赋诗留墨，蓬莱阁盛名远扬。“波涛今古吞元气，岛屿东西挂夕阳”，海上波涛从古至今都如此澎湃，太阳从蓬莱岛屿东升西落。“仙圃几人求大药，孤根何处托扶桑”，讥讽秦皇汉武遣人来蓬莱仙山求长生不老之药。“万流转识朝宗意，并倚危栏望帝乡”，所有的臣民都应该为国效力，诗人倚靠在蓬莱阁上，抚今追昔，心里装着的是保家卫国的大业。此首诗作虽是通过秦始求仙一事的讥讽嘲笑来激励保家卫国之心，但也有以秦皇汉武所建下的

32) 徐夏等编，《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2479页

33)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好为古诗文，始于李攀龙主文盟，攀龙死，独主文坛二十年。

34)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26页

35) 蹇达，明代嘉靖壬戌(1562)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山东金事，万历年间升任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后官至右都御史兼兵部尚书，总督苏、辽、昌平、保定四镇军事，加太子太保(从一品)。在支持朝鲜抗倭的“壬辰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36)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33页

丰功伟业来激励自己的诗篇。如著名的爱国将领戚繼光³⁷⁾在《过文登营》³⁸⁾一诗中提到：“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诗人以秦皇汉武时期巡幸山东的壮观、国家强盛的场面来对比现在倭寇入侵、民不聊生的现状，睹今思昔，希望自己能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担，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此首诗作中诗人见解独特，能够以秦皇汉武之强盛来激励自己保家卫国之心，从正面来评价这两位千古帝王的功绩，别具特色。

通过对明代文人登州咏史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两国文人的诗作在思想内容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明代文人的诗作中，并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儒家思想意识，特别是明朝中期，诗作中反而挣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呈现出道家色彩，并引发哲理性思考，这与明代时期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自明代初期起，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视为官方哲学，使其成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束缚文人思想，加强统治者思想统治的有利工具，从而导致文学上歌功颂德的台阁体一度滥行，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明代诗文的发展。自明中后期开始，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开始逐渐出现，前后七子掀起了诗文复古运动，倡导秦汉之文，反对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之文，诗作上也提倡以言情为主的盛唐诗，反对理学影响下的宋代诗风。故王世贞，吴维岳等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模拟盛唐咏史诗的风貌，注重诗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此归结为是融会儒、道思想而归宗自然，将情感寓于史实。其实道家思想自身也具有着强烈的复古、重古意识的，若以道家的世界观来看待历史，历史终将逝去，留下的总是破败苍凉之景。

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思想统治的根基，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中有着深深的烙印。然而明朝年间，朝鲜作为中国邻边的一个藩属小国，其咏史诗作中却表现出比明代文人更强烈的儒学影响下的政教文学观。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思想已经充分地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国家，随着儒家思想的外传，华夷观念使得周边国家对华夏文化有着深深的仰慕之情。慕华之风早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就已出现，当时的新罗国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并且向唐朝请求赐衣，慕华之情可见一斑。及高丽和李朝时期，朝鲜的统治阶级更是一直对中国实行“事大政策”，对于明朝交往的礼节制度都详加规定，明朝虽规定朝鲜三年一朝贡，但朝鲜进贡的次数往往一年高达数次，故明朝也对朝鲜“厚礼之，异于他藩”，并以“礼仪之邦”称之³⁹⁾。在这种情况下，当使臣们来到登州，对自己思想身份的认同性更加强烈，故诗作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更为明显。这点在朝鲜使臣的登州诗作中也可略窥一二。如李崇仁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作《阻风留登州次壁上诗韵》⁴⁰⁾一诗，其中写到：“圣化今无外，吾邦保小东。几时驰使节，仪制慕华风。”再者，由于登州所在地齐鲁一带，自古便是文学之邦，

37) 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安徽定远人，生于山东济宁。明朝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8)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29页

39)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第19页

40) 袁晓春编注，《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第31页

加上又是孔子的故里，儒家思想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朝鲜使臣对齐鲁一带怀有特殊的仰慕之情，诗文中所流露出的儒家士大夫意识也更为强烈。

2. 表现手法与诗体特征

咏史诗根据其咏史的意图不同，表现手法也不尽相同。诗人在咏史诗中采用各种表现手法，来烘托诗的氛围，增强其感染力，进而达到诗人想要表现的艺术效果。在对历史人事的叙述或诠释上应当处理好史事材料与当前实际视境，使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诗化的意境中表述自身感悟，并引起共鸣。在表现手法部分中将着重从“抒怀与议论”，“用典技巧”，“诗体特征”等三方面着手进行比较。

1) 抒怀与议论

抒怀是指通过所见古迹古事，看历史沧桑，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怀。议论是指通过所见古物联想古事，评论古事，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政治思想。从明朝年间，两国文人的登州咏史诗诗作情况来看，明代文人的登州咏史诗重在借古抒怀，注重诗人个体情怀的抒发，感性成分更多。而朝鲜文人侧重于议论，通过对古人古事的评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理性成分更多。这点在丽末鲜初时期，朝鲜使臣吟咏秦皇汉武寻仙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如郑梦周的《蓬莱阁》一诗：

蓬莱阁⁴¹⁾
采药未还沧海深，秦皇东望此登临。
徐生诈计非难悟，自是君王有欲心。

在这首诗作中，郑梦周用“采药未还”、“秦皇东望”、“徐福诈计”等典故对秦始皇东巡求仙药之事展开议论，得出了“自是君王有欲心”的结论。全诗没有格外修饰，语言质朴，教育意义深刻。

理学大家权近在洪武年间出使途中，留宿登州蓬莱驿馆，写下了《宿登州蓬莱驿，咏怀古迹四绝》⁴²⁾，在这组诗中亦是以议论的形式展开对登州地区有关的历史人物事迹的吟咏，对秦皇汉武的荒唐求仙之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发出“汉皇何不鉴秦家”的感慨，同时还对隋炀帝穷兵黩武，曾征讨高丽，落得“萨水流尸自可悲”的下场进行了讥讽。《诗·大序》中对诗歌的功能有过这样解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⁴³⁾诗歌应该为现实服务，对当时的政治起到一定的作用，使臣们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政教

41) 见注6

42) 见注8

功能，以议论的方式来探讨君道问题，虽然高丽末期国家政治及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然而使臣们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忧国忧民，忠君爱国，肩负着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

除了在咏史诗中以议论的方式来讨论君道问题外，也有不少朝鲜使臣也在诗作中吟咏历史名人，特别是对苏东坡及其《海市诗》的赞赏。如洪武年间，李崇仁⁴⁴⁾作《登州蓬莱阁感怀》⁴⁵⁾：“坡仙绝唱谁能和，客岛幽魂每欲迷。自是登临多古意，非开游子独悲凄。”诗中的“坡仙绝唱”即指的是苏东坡在登州所作的《海市诗》。对于《海市诗》，朝鲜使臣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子瞻《海市》一诗，尤为瑰奇，斯可以大游人眼孔。⁴⁶⁾”李崇仁在此首诗中以议论的口吻称赞苏东坡的《海市诗》无人能唱和，登高怀古心中是充满了高雅的怀古情调，不同于其他游子心中的悲凉感伤之情。

其实咏史诗中的议论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对史实的评论、阐发中抒发个人情感、表达个人见解，是明显的议论⁴⁷⁾”，另一种是“敷衍史事，诗人的思想情感议论褒贬寓于叙事咏叹中，一般不直接表露⁴⁸⁾”。丽末鲜初时期，朝鲜使臣的诗作中存在明显的议论成分，而朝鲜中后期的诗作则属于第二种议论情况。

朝鲜中期使臣们咏史作品中的议论更多的是与咏史怀古的情绪相互融合，也没有明确地以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如天启三年，朝鲜奏闻请封使团书状官李民成游览蓬莱阁，写下了《登蓬莱阁》一诗提到的“秦皇何所得，汉帝亦无成”。崇祯元年，任朝鲜冬至圣节使团书状官的申悦道在《归路登蓬莱阁》中写有“一去仙童终不返，三神灵药竟难求”等。在这些诗句中的议论只是作为诗人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手段。丽末鲜初时期与朝鲜中期使臣们作品中的议论之所以会呈现不同的情况，这与两个不同时期内朝鲜文坛崇尚的诗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丽末鲜初时期文坛尊崇宋代诗风，而朝鲜中期尊崇唐代诗风。

明代诗人的登州咏史诗作偏向于以抒怀的形式展开。特别是嘉靖年间以吴维岳，王世贞等为代表的诗作大家注重将山水之美与历史沧桑相融合，都是感性之作。如前文中提及到的吴维岳在《登蓬莱阁六绝》组诗第一首及第四首中写到：“海水冥冥春又绿，至今无处问徐生”，“漫将海水论深浅，历尽沧桑是白云”，王世贞的“风雷忽卷秦桥去，日月还依禹碣悬”等诗句都是在描写山水景色的同时，通过自然生命的永恒与古人瞬逝、古事无迹来抒发了古人胜事不在之情，使人陷入无尽的哲思之中。明代中期由于诗文复古运动的提倡，反对以议论为诗的宋诗诗风，诗作中自然更注重抒怀。

43) 汉·毛氏传，郑氏笺，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编辑，《毛诗》，山东友谊书社出版，第20页

44) [韩]李崇仁，(1347~1392)，高丽末期，朝鲜初期著名的文人学者。号，陶隐。在性理学及诗文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

45) 袁晓春编注，《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第33页

46) [韩]林基中，《燕行象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147页

47) 何晓园，《初盛唐诗歌议论的思想呈现与表现手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第70页

48) 同上引

明代后期同样在诗文中注重诗人的主体性，充分抒发了诗人的个体情怀。如陶郎先⁴⁹⁾的《登蓬莱阁》⁵⁰⁾：

蓬莱踪迹半虚真，杰阁峨峨俨若神。
槛外浮槎还逼汉，石边短碣尚称秦。
苍茫海国悬东极，错落星芒动北辰。
千古沧桑谁定是，止馀鸥鸟一相亲。

这首诗开头先是勾勒了蓬莱阁的整体形象，巍峨耸立。颔联提到秦皇汉武来登州一事，虽然“浮槎”、“短碣”等让人回想起秦汉当年的情景，然而“千古沧桑谁定是，止馀鸥鸟一相亲”，诗人发出感慨，沧海桑田，时光流逝，也只剩下海鸟在海面飞翔。虽然在文学史上，明代诗文的成就与地位并不高，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特别是中后期，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重视自我主观心灵，对诗人个体性和主体性的肯定都是诗文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2) 用典技巧

用典是古代诗歌创作中较为常见的手法之一，“援引前人的事迹或摘取前人作品中的词句来阐明自己的观点⁵¹⁾”，语言精炼含蓄，表达内容丰富。在咏史诗中用典的使用显得格外重要，用典不仅仅是简单的援引，更是诗人自身思想情绪的一种映射，将个人的思想用更为浓缩的语言表现出来。用典功能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即借词，借事，借境。借词，“借用典故，可以用来替换一般常用的字词⁵²⁾”，即简单地换词。借事，“利用史实故事被人熟知的内容，用来替代或暗示所要表述的事物⁵³⁾”，将史实点到即止，不必再格外费笔墨去描述。借境最能发挥用典的艺术表现力，“凭借典故所具有的特殊意境，引起联想，使所写的情事也受到那种意境的浸润⁵⁴⁾”，典故中的意境与当前所要描写的情景巧妙融合，产生浓厚的情韵和诗意。所以一首好的咏史作品不仅要善于利用借境，还要将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寄寓到典故的意境里面去。所谓“借词不如借事，借事不如借境⁵⁵⁾”。对朝鲜使臣来说，用典的熟练掌握自然是有一定难度的。

纵观两国文人的咏史诗作，赵鹤的《登州蓬莱阁观东海》与李民晟的《登蓬莱阁》诗中的怀古之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位诗人在用典方面却有显著的不同。通过下文的对比分析，探究其用典技巧。

49) 陶郎先，明代万历年间曾任登州知府。后遭弹劾因贪赃军饷被免。

50)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53页

51) 高蹈著，《古代诗词语言艺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第110页

52) 李文沛，《诗歌用典的功能和技巧》，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1期，第34页

53) 同上引

54) 同上引

55) 李文沛，《诗歌用典的功能和技巧》，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1期，第36页

登州蓬莱阁观东海⁵⁶⁾

蓬莱阁下晚凉开，倦客乘凉坐未回。
不住鸟声冲雨过，有时龙起带潮来。
愁云尚识田横岛，仙月还虚汉武帝台。
回首夕阳瀛海上，一尊怀古独徘徊。

诗人傍晚乘凉于蓬莱阁下，观看到海面上的雨景及涨潮之景。“愁云尚识田横岛，仙月还虚汉武帝台”一句自然地将现实与历史穿插，用田横岛⁵⁷⁾和汉武帝求仙两个典故，结合当前空间的云与月，缭绕不散的乌云尚且记着五百壮士的忠烈之举，一轮仙月依旧照射着汉武帝求仙所搭建的汉武帝台。在这样的氛围中，诗人怀古抒情，回首夕阳下的沧海，独自饮酒惆怅，感情深沉凝重。

天启三年六月(1623年)，朝鲜奏闻请封使团书状官李民成游览蓬莱阁，写下了《登蓬莱阁》：

登蓬莱阁⁵⁸⁾

秦皇汉武遣方士望海中蓬莱山，故名。
门虚碧浪涌，楼回彩霞明。
水落田横寨，天低不夜城。
秦皇何所得，汉帝亦无成。
远客凭栏久，沧溟月又生。

诗人在题注中简要地说明了蓬莱阁命名的由来。诗的首联描写了蓬莱阁的近景，水城大门敞开，城下碧浪翻涌，蓬莱楼阁回旋，天边彩霞明艳。颔联描写了蓬莱阁周边的远景，海水退潮在田横寨，天际低垂笼罩着登州这座不夜城。颈联进入怀古议论，秦始皇汉武帝求仙寻药一无所得。尾联抚今，远方的客人久久地倚栏深思，在这苍茫的海面上，一轮明月又缓缓地升起。全诗远近结合，情景交融，意境生动。

从用典的技巧来看，赵鹤更胜一筹。只用了“田横岛”、“汉武帝”等几个简单诗语便代替了对历史事件的陈述，增强了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并且运用拟人的手法，“愁云尚识”、“仙月还虚”将典故与当前景色融为一体，既巧妙地发挥了典故的借境功能，又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怀

56) 见注28

57)《史记·田儋列传》附《田横传》：“后岁余，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横)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以王者礼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多比喻赞颂坚贞不屈、誓死不投降的英雄主义精神。参考《中国典故大辞典》整理，辛夷、成志伟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第681页

58) 见注13

古思绪，使整首诗歌更具韵味，回味无穷。相比之下，朝鲜使臣李民晟直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对这一历史史事进行了评论，虽明确表达了对秦皇汉武之事的褒贬态度，但这种用典方式使得当前场景与历史呈现出一定的疏离状态，与赵鹤的用典技巧相比，可谓稍逊一筹。

明代诗人在咏史诗中的用典形式可谓是千姿百态。如王世贞在《和吴峻伯蓬莱阁六绝》⁵⁹⁾其中三写到：

绛节秋逢鸾鹤群，安期遣信欲相闻。
袖中亦有千年枣，不羨瀛洲五色云。

诗人在诗中活用了“安期遣信”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将其作为表现自己旨意的一种手段，体现出用典的特异性。据《列仙传·安期先生》所载：“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秦始皇离去后，安期生留书秦始皇：‘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⁶⁰⁾安期生本是遣信于秦始皇，而在此诗中，诗人说安期生送信求见于自己，但诗人自己衣袖中已有千年枣，并不羡慕踏着五彩云朵的神仙。通过反用典故使整首诗清秀脱俗，别具匠心，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不屑。上文中所引用的吴维岳“鞭石乘槎迹未分”一句，也是不动声色地将典故嵌入到诗歌之中，使典故与整首诗的意境有机融合在一起，借典故来渲染情感气氛，诗人的主观感情与典故中的情感相互融合渗透，浑然一体。由此可以看出明代诗人运用典故的技巧非常娴熟，相比之下，朝鲜使臣的用典技巧比较生硬，但从援引典故的内容来看，文学修养很高，汉文学识渊博。

3) 诗体特征

“文体虽然属于文学形式方面的一个因素，但它反过来也影响着文学思想内容的表达，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题材、风格有制约性。”⁶¹⁾由此可见体裁对于诗歌的构建及所蕴含思想内容的表达传递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可谓是成于唐，备于宋，结于清，明朝处于完备与终结的过渡阶段，虽整体成就上不及唐宋，集大成亦不足于清，但在体裁上也是众体皆备。朝鲜半岛的汉文诗歌创作在高丽末期也步入成熟期，众体俱备，甚至还出现了尝试入乐的词曲创作。从朝鲜使臣的咏史诗作中不难看出，朝鲜文人们已经可以成熟地运用五七言进行创作，其中主要以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居多，偶有七言组诗和五言律诗的形式出现。如权近的《宿登州蓬莱驿，咏怀古迹四绝》是以七言组诗的形式展开咏史。李民晟的《登蓬莱阁》是以五言律诗的形式展开议论。而明代文人的咏史作品中几乎都是七言为主，以绝句、

59) 见注34

60) 刘向《列仙传·安期先生》，《四库全书》第10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95页

61) 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3页

律诗、组诗的形式咏史。由此可见至明朝年间，韩中两国诗人在登州所作的咏史诗都善于选取七言的格式。五言与七言虽然每句只有二字之差，但“五言直而倨，七言纵而畅⁶²⁾”，在意境的刻画，信息的表达传递及诗语的灵活组织运用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咏史体裁中选取七言体式，可以充分发挥句式较长和诗语组合方式灵活的特点，给予诗人更多的发挥空间来尽情畅纵。此外，由于五言诗字少句短，字词组合大多以两个双字结构加上一个单字结构组成，“以奇数而得在句中置一动作字，遂能形成单、双字结构而致一句意完⁶³⁾”；而七言诗的句式变化多样，一句中可以出现两个动作字，故五言就显得过于呆板，而七言就显得灵动自然。在对古诗体裁的论议中，历来学者多有评述，特别是清代，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集大成时期，张维屏⁶⁴⁾曾在《国朝诗人徵略·听松庐诗话》中对袁枚⁶⁵⁾评论到，“诗则以七律为最，七绝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华富赡，奔放有余，然好为可惊可喜，遂涉于粗俗，近于游戏者有之。”⁶⁶⁾学者们对七言律诗的肯定确立了其在古诗中的重要地位，七言律诗由于联对的并列性，能够容纳更多的意象组合，在咏史怀古中自然更顺心得手。

此外，明代文人的咏史诗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连缀而成的组诗。咏史组诗中既有对在此遗迹上出现的历史故事的赋咏，同时又有对该地自然山川，风景名胜的赋写。如吴维岳的《登蓬莱阁六绝》，该组诗由六首七言绝句组成，各首均从不同的视角对蓬莱阁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进行了描写，清词丽句，向我们勾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蓬莱仙境图，在飘逸的仙境中贯穿历史古迹场景，历史与现实相互穿插，在对历史的回味中，略带伤感主义。王世贞亦留下不少组诗，如《蓬莱阁后六绝》⁶⁷⁾、《和吴峻伯蓬莱阁六绝》，均是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借景论史，赞美了蓬莱阁的人文历史及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和吴峻伯蓬莱阁六绝》为例，诗中或提到活跃于蓬莱沿海一带的安期生，或以“秦桥”概括了秦始皇来此地求仙一事，或慨叹田横五百壮士，充分发挥了绝句贵在含蓄的特点，将空间意象，事件意象并列结合起来，把蓬莱古老的传说及悠久的历史巧妙地融入诗中，形成清新隽永，豪健悲慨的意境风格。吴维岳与王世贞的蓬莱组诗其旨都在赞美蓬莱阁，其咏史的目的与政治社会的相关性联系较少。而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咏史组诗虽然不多，唯有权近的《宿登州蓬莱驿，咏怀古迹四绝》，但不同的是，诗人在诗中极力铺张历史事件，点评历史，议论纵横，通过对历史的对比来为自己安身立命提供某种借鉴，在对历史的领悟洞察中总结出理性。

62) 易闻晓著，《中国诗句法论》，齐鲁书社，2006，第237页

63) 同上引，第237页

64) 张维屏，(1780~1859)，清代官员、诗人。字子树，号南山，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唱霞渔者，广东番禺人。著有《国朝诗人征略》，全书共计六十卷，收录了1095家作品。

65)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与赵翼、蒋士铨合称“江右三大家”。

66)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捌之附录三《袁枚评论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页

67)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蓬莱诗集》卷一，2009，第24页

III. 结语

通过对韩中两国文人笔下登州咏史诗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思想内容方面,朝鲜使臣们更注重从理性的角度,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以古鉴今,寓论于史,其思想内容的重心始终以国家社稷为重,不忘出使使命,充分展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特色。而明代文人的登州咏史诗作注重于个体情感的抒发,抚迹寄慨,寓情于史,诗作中没有强烈的儒家思想意识,对国家政治等有关君道问题的讨论也较少。在表现手法方面,朝鲜使臣喜欢以议论的形式展开对相关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或明显地通过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或将议论作为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手段。在用典方面,技巧相对来说还不够纯熟,只是单纯的叙说典故,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而明代文人的登州咏史诗大多以抒怀的形式来抒发诗人的个体情怀,通过自然生命的永恒与古人瞬逝、古事无迹来抒发古人胜事不在之情,引发哲理性思考,典故的运用也更为灵活多样。在诗体方面,两国文人都喜欢选取七言体式来咏史,与五言体式相比,七言诗更适合畅纵,诗中可以融入较多的意象来构建诗的意境或思想内容。此外,两国文人的诗作中都有组诗形式,不同点是明代文人通过组诗形式,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历史事件,来吟咏登州的古老文化和蓬莱仙境,咏史目的与政治社会的关联性较少。而朝鲜文人笔下的登州咏史组诗侧重于点评历史,铺张历史事件,旨在通过对历史的领悟洞察来寻求借鉴。朝鲜文人的咏史诗雄浑深邃,以力度胜出,明代文人的咏史诗空灵超然,以神韵胜出。

【參考文獻】

-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蓬莱诗文集》全函三册,2009年
袁晓春,《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山东: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年
山东友谊书社编,《蓬莱历代诗文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孙学堂,《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
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刘焕阳、刘晓东,《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
李伯齐,《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山东:齐鲁书社,2005年
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金宽雄、金东勋,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5年
宋克夫, 《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王洋, 《明代朝鲜朝使臣咏史诗研究》, 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王玲玲, 《明代朝鲜使臣登州诗歌研究》, 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徐中慧, 《“登州海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韓文概要】

시는 고전문학의 진수로서 그 사상내용과 예술표현은 시인이 살았던 시대와 지역 및 시인의 사상 감정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 그렇다면, 시대는 동일하지만 서로 다른 문화 배경을 가지고 있는 한중양국 문인들이 동일한 장소에서 쓴 시가에는 어떤 다른 점이 존재하고 있을까? 본 논문은 이런 관점에서 중국 명나라시기에 한·중 양국의 문인이 산동성 등주 일대에서 쓴 영사시를 연구대상으로 삼아 사상내용과 표현수법 두 가지 측면에서 비교를 진행하였다. 이를 근거로 등주 영사시에 반영되어 있는 양국 문인의 사상, 심미관 및 표현기교 등에 대하여 심도 있는 분석을 진행하여 양국 문인 시작의 상사점과 차이점을 밝혔다.

첫째, 사상 면에 있어서 조선의 사신들은 이성적 측면을 더욱 중시하고, 유가사상의 영향 아래 옛일을 귀감으로 삼아 역사에 의론을 붙였는데 그 사상내용의 중심은 시종 국가사직을 중시하여 사신의 사명을 잊지 않음으로써 문인 사대부로의 특징을 분명히 드러내었다. 반면에 명대 문인의 등주 영사시는 개인의 감정을 서술하는데 치중하여, 역사를 회고하여 감개를 기탁하고 감정을 토로함으로써 시속에 강렬한 유가적 사상이 드러나 있지 않고 국가정책 등 君道에 대한 의론이 비교적 적었다.

둘째, 표현수법과 시체에 있어서는 다음의 특징을 볼 수 있다. 조선의 사신들은 등주와 관련한 역사적 인물과 사건에 대하여 의론의 형식으로 평론을 전개함으로써 자신의 관점을 분명하게 드러내었고, 의론을 자신의 감정을 표현하는 수단으로 삼았다. 용사에 있어서 조선의 사신들은 기교가 상대적으로 숙련되지 못하여 단순하게 전고를 서술함으로써 노숙한 경지에는 이르지 못했다. 반면에 명대 문인들의 등주 영사시는 대부분 감정을 서술하는 방식으로 시인의 정회를 서술하고 자연생명의 영원함과 인생의 짧음, 사라진 유적 등에 대하여 아쉬운 감정을 토로하고 철리적 사상을 표출했는데 전고의 운용도 더욱 원활하고 다양하였다. 시체에 있어서 두 나라 문인들은 모두 칠언시체를 사용하여 영사시를 썼는데, 오언시에 비해 칠언시가 상대적으로 시속에서 비교적 많은 의상을 빚어내고 시의 의경과 사상내용을 풍부하게 할 수 있었기 때문이다.

【中心語】 登州, 蓬萊閣, 詠史詩, 朝鮮使臣, 風格, 意象, 典故, 懷古.

접수일자 2014.07.10 심사완료일 2014.08.03 게재 확정일 2014.08.15